



黎明前的较量（一） ——宁夏解放的回忆与思考



前左一为宁夏和谈代表卢忠良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其左为解放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资料图片）

1949年，继西安、兰州解放之后，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了解放宁夏的方针政策：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西北战场的军事统帅、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整个西北战场作了全面的安排部署：第1军留青海，第7军留天水，第62军留临夏，第4军之12师留兰州，这3个军1个师担任工作任务，其他部队，由第2兵团及第1兵团率领进军河西走廊，追歼兰州战役之残敌，为进军新疆创造条件；第19兵团进军宁夏，追歼宁夏马家军，解放宁夏。

19兵团9月1日接到野司进军宁夏的作战命令后，分三路，向宁夏进军，左路为63军的188师，于9月2日从兰州沿黄河两岸前进，15日攻克甘肃景泰县后，全部渡过黄河从北岸向中卫县疾进，17日攻占沙坡头和迎水桥，兵临中卫城下；中路为63军和65军，于9月5日出发，从兰州黄河右岸与188师夹河并进，于16日到达中卫县黄河南岸之常乐、永康、宣和一带；右路为64军及陕北独立第1师和第2师。64军于9月10日开始从固原地区出发，12日解放同心，14日解放中宁。至此，中宁以南地区全部解放。

宁夏马家军，听似一家，实乃两家，这就是马鸿宾和马鸿逵。他们二人本是同一祖父的叔伯兄弟，但因利害不同，所以“一槽二马，相争不懈。”二马相较，马鸿宾态度比较开明，平素受马鸿逵的气，不愿与其同归于尽。9月初又前往包头，听取过当时在包头指导绥远董其武部起义的傅作义将军和邓宝珊将军的劝告，有和谈

意向，但顾虑很大。担心一旦宣布起义，马鸿逵对其下手，自己将吃大亏，因此犹豫不决。马鸿逵则态度顽固，从各种表现看，无和谈可能。

马鸿逵反共的态度是一贯的。红军时期，他就和共产党作过战。抗日战争时期，他封锁陕甘宁边区，给延安造成很大困难。1949年8月19日，傅作义将军受毛泽东主席委托，从包头给马鸿逵打电话，劝其弃暗投明，和平起义。马鸿逵表示，非打不可。兰州解放后，彭德怀委托与马鸿逵素有交往的兰州军管会副主任韩练成将军出面作马鸿逵的工作。韩练成以叙旧方式致函马鸿逵，劝其当机立断，悬崖勒马，接受中共中央约法八章，率部起义，走光明之路，马鸿逵又断然拒绝。

马鸿逵不听朋友的劝告，吃了秤砣铁了心，决心要打。他自行增编一个军，没有番号，就取岳飞《满江红》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之意，命名为贺兰军，准备一旦川区失守，就钻进贺兰山去打游击。贺兰军与128军、11军共同隶属于宁夏兵团，由其时任宁夏兵团司令官的马敦静（马鸿逵次子）统一指挥。8月1日，马鸿逵从广州电令宁夏兵团死守宁夏门户——固原。可是当天人民解放军19兵团64军对固原东南的任山可发起总攻，宁夏的11军战败溃逃，被保5000余人，次日，固原解放，8月3日，隆德解放，8月11日，海原解放，8月13日，西吉解放。8月19日，马鸿逵慌忙从广州飞回银川，此时，宁夏已经金瓯不全了。

马鸿逵回到银川，又是制定

作战方案，又是召开军事会议，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提出“打光、烧光、放水”政策，信誓旦旦地说：“银川城内放火时，先由我的公馆烧起。”又说：“宁夏要效法太原阎锡山的办法，抵抗到底，就是损失尽净也在所不惜，最后阎锡山还不是当了行政院长吗？”看样子，他要与银川共存亡。

8月26日，兰州解放，绥远省正在积极酝酿起义。蒋介石担心马鸿逵与董其武协同，把绥远、宁夏连成一气，于是派代理国防部长 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和国防部次长秦德纯来宁监视。9月1日马鸿逵随徐永昌飞往重庆，成了蒋介石的人质，把烂摊子扔给了他的儿子马敦静。

人民解放军19兵团执行中央“尽可能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宁夏问题”的方针是积极的，真诚的。早在5月20日西安解放之后，19兵团政治部对敌联络部部长甄华即着手物色与宁夏方面沟通意见的联络人员。他通过西安上层民主人士找到了原马鸿逵部少将交通处长孟宝山，经过思想发动和政治交底，发给路费，让其速回银川，作马鸿逵的工作。孟宝山于8月14日到达银川，马鸿逵于8月19日由重庆返回银川，8月21日孟宝山见到了马鸿逵，呈交了马鸿逵的老友赵不廉劝马鸿逵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和中共中央的《约法八章》，马鸿逵仔细阅读后说：“民国25年（1936年），共产党的前锋逼近了盐池、豫旺，我就退守金灵，没和他正面冲突，究竟挑起衅？”又说：“嗣后援助榆林、包头，以及最近援助西安，迫不得已而为之。我不是主动者，能和别人一样列为战犯吗？”言下之意，他对得起共产党，共产党对不起他，对 战与和，不正面表示态度。8月23日兰州解放前夕，马步芳派人来宁催他出兵援兰，孟宝山又一次见到马鸿逵，劝其切勿援兰。说：“援兰的后果，一无补于大局，二削弱你自己的实力，三得罪了人民解放军，四你失去了最后与人民解放军和谈的时机，也削弱了你进行和谈的本钱，到那时候，你即使想向绥远看齐，恐怕也晚了。”马鸿逵则说：“你好好住着，我们以后再说。”又不表态。9月1日早晨，孟宝山得知马鸿逵要和徐永昌一同飞赴重庆忙借了辆自行车赶去，马鸿逵已走出公馆，用吩咐的口吻对他说：“一切和司令官（马敦静）去商议。”一句话封住了他的嘴。中午，他见到马敦静，马敦静叫他速速离开银川——他被驱逐出境了。

兰州解放后，甄华又通过关系，找到与马鸿宾、马鸿逵有交往的民主人士座谈，组成以国民党退休军政官员、回族知名人士以及宁马高级官员亲属为主体的宁夏和平代表团，他们中有郭南浦、马宏道、马凤图、马季康、马元凤、马忠汉、白连升等人，持彭德怀亲笔信，于9月6日从兰州出发，到固原后随64军前进，9月13日到达同心县马家湾河后，遇见了被马敦静撵出银川的孟宝山，一同到了中宁。孟宝山留下，其余人继续前进，于9月14日夜到达银川，马敦静拒绝见面。16日，马鸿宾夹上门来，说：“马敦静是我的侄子，但我们多年不来往，此刻他不找我，我也不能去找他，只有81军马倬靖部我能负责。我给他去电话，让他在石空渡口和你们见面，研究起义。”于是他们留郭南浦在银川，继续与马鸿宾保持联系，其余人连夜折回石空渡口，次日在石空渡口与马倬靖见面，终于促成了81军的起义。9月19日下午7时，双方代表在中宁签署协议，81军接受改编，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81军起义的当天，即9月19日，马敦静也步其父马鸿逵之后尘，搭乘徐永昌的飞机逃到重庆去了。树倒猢猻散，宁夏兵团的将领马全良、卢忠良、马英才在仁存渡口商议去从。20日，宁夏兵团28名将领签名发出由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起草的求和通电：国民党秉政以来，领导无力，纲纪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70万军民遭受涂炭，于9月20日停战。服从毛主席领导，实行民主，俾人民登于衽席，国基安如磐石。但通电发出后，宁夏兵团128军仍在顽抗。于是人民解放军64军根据19兵团指示，打谈并重，双管齐下，以打促谈，谈不误打，发起金灵之战，俘获7000余人，击溃大部，将128军歼灭于金积吴忠、灵武。

9月22日，宁夏军政要员会集在银川马鸿宾的私邸“五亩宅”，公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为和谈代表，马鸿宾指定卢忠良为全权代表，共赴中宁谈判。23日到达中宁19兵团司令政训机关驻地，向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耿飚参谋长、潘自力主任递交证明书，代表宁夏方面接受和平，解放军提出五项协议草案，宁夏代表认为内容非常宽大，全部接受，双方签字承认。23日夜，人民解放军进驻银川，从此宁夏和平解放。

（据《中宁文史资料》）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春节新气象

农历新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与真诚期许。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将革命理念与传统年俗相结合，使革命根据地的春节习俗发生巨大变化，群众积极参与到各种新式庆祝活动中来，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形成极具特色的“红色春节文化”，处处彰显辞旧迎新、团结奋进的新气象。

一

国民党统治边区时期“过年难、难过年”是当时广大穷苦农民春节的真实写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革命根据地建立前。

中国共产党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后，积极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农民的田赋、劳役、杂税等均大幅减轻，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得到提高。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动手，种菜纺纱。1942年12月，毛泽东发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进一步推动了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到1943年，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达到全部自给，不仅改善了物质生活，而且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党带领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提高田地产量，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购买耕牛、农具和种子，鼓励农民耕种经济作物，发展家庭养殖业和手工业。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农民的生活状况日益好转。过年时，农民家里不仅有了余粮，还养起了猪、鸡、鸭、鹅等，除夕也能包上猪肉白面水饺，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顿年夜饭。

二

从1937年1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保安迁至延安，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直坚持与人民群众一起过年。1941年的春节期间，在延安中央机关礼堂演戏，附近许多群众也应邀前来观看。一天晚上，毛泽东走进礼堂后发现干部战士都坐在前面，而老乡们都坐在后面，最前面的两排座位空着留给中央首长。毛泽东便对在场的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老乡们平时生产忙，看戏的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来到这里，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老乡们很感动，一再谦让，最后还是被毛泽东劝说坐到了最前面。多年来，这件事一直成为延安人民的美谈。

1943年，毛泽东从杨家岭搬到枣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他从不以领袖自居，常称自己为“枣园的居民”。每逢春节，他都会请当地农民来住所过年、吃饭，还常常去看望枣园的乡亲们，给大家拜年。1946年正月初三，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枣园宴请延安市西区居民代表。席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给大家斟酒、敬酒，并亲切地拉起大家来，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勉励大家和平时期加紧生产，注意卫生节约。他们对农民情况了解之细致，对百姓生活关爱之周到，无不令当地群众交口称赞。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度过了11个农历春节，每逢过年，当地群众都会自发前来向中央领导人拜年，有的还会带上软糕、油馍、黄酒等年货，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党和政府的真诚拥护。1946年春节，延安县川口区六乡人民代表到王家坪给中央领导拜年，并将一块写有“人民救星”的金字匾献给毛泽东。收到礼物的毛泽东，给大家鞠躬致谢，人们簇拥在他跟前，激动地合影留念，对党和领袖的热爱溢于言表。

在党中央密切联系群众这一优良作风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和广大解放区结合各地具体情况，纷纷号召党的各级机关、部队组织开展“翻身大团拜”、春节联欢会等活动，邀请当地农民、“翻身英雄”、劳动模范共庆新年。

三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群众在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也有了很大变化。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掀起文艺大众化的热潮。从1943年的春节开始，边区的秧歌运动蓬勃开展，当时的秧歌队多达数十个。边区文艺工作者在学习借鉴边区民间艺术的过程中，对传统秧歌进行了改造，使边区不仅涌现出歌舞形式的新式秧歌舞，还推出戏剧形式的新式秧歌剧，内容以反映革命背景下民众生活为主题，其表演方式、人物服装造型、舞台布景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仅具有艺术表现力，而且还凸显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时代特色。以《拥军花鼓》《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秧歌，亮相延安街头。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农民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并投入到革命化的春节娱乐活动中。大家把腊月二十三的“辞灶节”改成“翻身节”，在这天不烧香、不辞灶，而是举行忆苦思甜会和全年生产情况总结会。从除夕到正月初五，村民们不敬神、不贴门神、不烧纸、不磕头，积极参加丰富多彩的新式文娱活动。各村都举行新年同乐大会，集体扭秧歌、唱大合唱、进行拜拜。村里还召开庆祝大会，搭光荣亭，把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请上台讲话；搭万寿亭，全体村民在这里向老人们祝寿；搭台唱戏，请文艺团体演出进步戏剧。

四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春节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举行“双拥”活动。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和《拥军公约》，确定从1月25日到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10天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一连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令》，确定从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2月1日，八路军中央机关礼堂演戏，附近许多群众也应邀前来观看。一天晚上，毛泽东走进礼堂后发现干部战士都坐在前面，而老乡们都坐在后面，最前面的两排座位空着留给中央首长。毛泽东便对在场的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老乡们平时生产忙，看戏的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来到这里，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老乡们很感动，一再谦让，最后还是被毛泽东劝说坐到了最前面。多年来，这件事一直成为延安人民的美谈。

在拥军优抗方面，春节期间，边区政府和人民对驻军和抗日军人家属进行了热情的慰问活动。政府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拨款6.2万多元（边币），专门用于慰问延安附近的驻军和抗属。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西北局的同志亲自带领慰问团到南泥湾、金盆湾进行慰问。他们走到哪里，哪里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边区政府平日更是优待抗属，除了减免一定的负担外，还采取贷款、捐献实物或现金等措施实行优待。

1944年农历正月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到处都掀起了双拥运动的热潮。延安市政府还组织起了一支300多人的市民秧歌队，与当地驻军、机关干部、人民群众一起欢度春节。在锣鼓声中，人民群众载歌载舞，唱出了“正月里来是新春”这首脍炙人口的拥军花鼓。这些活动让军属们感到无限光荣与欣慰，很多军属给前线的亲人写信，鼓励他们奋勇杀敌。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下，边区的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进入了深入持久的发展阶段，不仅加强了边区党政军民的团结，彰显了鱼水情深，而且在对敌斗争和边区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还为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双拥运动做出了榜样，提供了经验。

（据民主协商新闻网）

秦汉时期的固原经济社会——农业与畜牧业

固原作为连接中原和西北边塞的边地，秦汉时期在这里设置行政机构加强管理的同时，农业和畜牧业、交通建设以及科学文化等方面也得到了发展。汉代，农业与畜牧业的的发展，推动着固原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迁。西汉时期，安定郡及其周边地区长期驻扎重兵，养兵主要依靠移民屯田和发展农业。西汉政府对于移民屯田给予了多种政策的鼓励，如招募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移民、减免赋税、政府提供免费的铁农具与牛、兴修水利工程等，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农业获得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也得到了大开发。安定郡及其周边地区是典型的民族杂居之地，这里本来就是水草丰美之地，非常适宜畜牧业的发展。此外，安定郡驻扎大量的骑兵，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推进，内附的少数民族如匈奴、西羌等，皆善于骑射，因而发展畜牧业更有其军事上不可比拟的价值。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交相辉映，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而横贯西北的中西交通的开通，促进了固原地区频繁的民族交融与繁荣的民族文化，使得固原社会历史变迁拥有了多元化色彩，为民族文化的繁盛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农业方面，秦始皇派蒙恬收复河南海后，沿黄河置44县，往长城以北地方移民来戍守边地，一些有农业技术的谪戍者一边戍边，一边屯

垦，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到西汉时期，朝廷多次徙民至固原地区，迁徙来的移民多为有较高农业生产技术的贫苦农民。汉代推行“代田法”“区种法”，取得了粮食增产的显著效果。粮食生产还得力于铁制农具的传播及大量使用，固原、彭阳、隆德等地均出土汉代铁铤，证明二牛抬杠犁法普遍使用。

秦汉时期固原地区的青铜铸造工艺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1968年在秦长城以北的固原头营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有鼎、提梁卣、壶、剑、戈等。鼎为圆腹，马蹄形足，附有双耳，高17厘米。另有一错银铜镞，细腰圆筒形，长6.9厘米，上端有（孔洞），可以装入戈、戟。在铜镞的外表及底部，有银丝镶嵌的图案。铜器上镶嵌金银丝，为一难度较大的铜器制造工艺技术。

冶铁业在西汉时发展了起来。在固原蒿店汉代遗址中发现铁块和铁矿渣。在隆德县坡发现汉代铁鼎，口径约80厘米，深60厘米。在泾源县果家山汉代遗址中出土铁釜。可见，此时固原地区已使用多种铁制农具和生活用具，由铁块、矿渣分析，当时铁器不仅由内地带来，而且本地也可以制造。铁制犁的使用，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在固原发掘的汉墓群中还出土有陶牛。东汉政府为了发展农业，加强边防，保证粮食供应，继续推行大力浚渠屯田的措施。

固原地区的畜牧业，是秦汉时期的重要产业。在战国时期，六盘山周边聚居着大量戎族，其中包括乌氏戎。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前337—前311），在乌氏戎族的主要聚居地设立乌氏县。其时，六盘山水甘草丰，适宜发展畜牧经济。秦统一六国时，著名商人乌氏倮通过与关外戎王进行贸易，成为乌氏当地的大牧主，拥有的马、牛、羊不计其数，为秦政府提供了充足的马、牛等战争和生活物资，既保证了秦的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满足了秦王朝的其他战事及工程、运输等需要。这种对秦国的政治、经济上的贡献完全可以和军功相比。所以当全国统一后，鉴于他的特殊贡献，并勉励他继续努力，秦始皇便赐其为“北封君”，给予他优宠待遇。

西汉初期，朝廷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百姓努力发展生产，战争造成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漠北的匈奴经常南下掠夺牲畜和财产，固原首当其冲，生产建设不能顺利进行。与此同时，漠北的游牧民族到这里定居后，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友好相处，相交流畜牧业和农业的生产经验。西汉王朝重视畜牧业的生产发展，朝廷在边郡设置6个畜牧业管理机构——牧师苑，其中有5个就靠近固原。官府鼓励边民养马，还贷给母马，以繁殖马匹，3年

后归还，10匹母马还官府，1匹小马。同时，政府十分重视扶持匈奴民众的畜牧生产，安置归顺的匈奴人从事畜牧业。由于政府政策措施得当，北地等郡出现了牛马遍野的繁盛景象。

东汉时期畜牧生产也有较快发展，安定诸郡出现了“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繁荣局面。固原等地已变成“饶谷”“多畜”并称的半农半牧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畜牧业丰饶的状况，同时也说明了东汉时期农、牧经济的交替发展。

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分工与交换，必然引起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商业发展还要求城市建设的相应发展。西汉时期的城市不仅是军事要地和政治中心，也是经济集散地。固原、彭阳等地都是汉代城址。汉代城址中还有建房用的砖、瓦及用于城市供水、排水的井圈、圆形、五角形陶水管。

交通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首先表现在城市的设施更完善上。固原的东汉城址中，城市建筑材料有卷云和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瓦当，绳纹板瓦，铺地花纹砖和铭文砖等，有的砖文刻有“大富昌，乐未央，子宜孙”等吉祥语。另外，还发现有陶井圈、陶管道，城市的供水排水设施更加完善。（据《固原通史》）